



游手好闲地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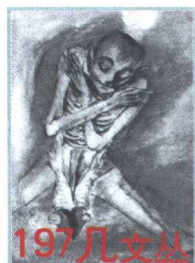
黄
钟
著

我们每个人既是
宽容的对象，
也是宽容者



游手好闲地思想

黄
钟
著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手好闲地思想 / 黄钟 著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5

ISBN 7-5443-0409-4

I. 游... II. 黄... III. 社会问题—研究—文集

IV. I.69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第 079237 号

游手好闲地思想

作 者: 黄 钟

责任编辑: 黄明雨

封面设计: 第三工作室

版式设计: 孙志敏

责任校对: 汤万星

责任印制: 李 兵

印刷装订: 北京宏伟印刷厂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9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书号: ISBN 7-5443-0409-4/B · 28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邮寄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 570216

序：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

秦 晖

黄钟先生的新著《游手好闲地思想》嘱我为序。我首先诧异于这个书名：什么叫“游手好闲”地思想？读罢全稿我明白了，作者在这里叙述的，大都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那些史有明载的人与事，并非石匱秘籍中的深宫隐奥。从这些史实中作者讲出的道理，也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常识，而不是那种行文艰涩用词怪癖逻辑费解似是而非的“高深”理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清清楚楚的史实却常常被人遗忘，这些明明白白的道理也往往被人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史家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真言噤声、假话盈宇的不正常状态。而那不甘毁弃的黄钟（恰巧这是作者的名字）便会在常识的基础上响起。——所谓《游手好闲地思想》，就是回到常识去，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吧？！

的确，常识可以证伪，但不能无视。

古往今来大部分最重要的知识创新（科学发现或人文思想突破）都是从对经验常识的证实或证伪中产生的。而大部分“皇帝的新衣”式的伪科学与“知识垃圾”都是从对常识的无知、回避和有意无视中产生的。

我们知道，所谓牛顿看到树上掉下的苹果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试验“两个铁球同时落地”而证明了重力加速度这类说法在科学史上并非实有其事，但牛顿与伽利略的



物理学理论是以能够解释苹果下落及铁球同步落地为前提的。它把这些日常生活中人们似乎习以为常不言自明的现象变成了得到严格逻辑证明的知识体系，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这种证明所包含的逻辑去发现日常经验以外的、种种比“常识”更为高深的新知了——所谓“科学”，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常识”只能被证明吗？当然不是，其实波普关于科学本质的“证伪主义”论证已经告诉我们：“常识”不仅可能被证伪，而且严格地讲，一切全称判断式的“常识”在逻辑上都不可能有限事例所证明，却可能被这样的事例所证伪。但是证伪之后人们并不是陷于虚无，而是提出了新的解释来“证明”更多的经验知识。当然这种证明在逻辑上都是不完全归纳，因而本质上只是一种认识过程中“有益的假设”，而这种“有益的假设”将来还可能被新的知识所证伪。这样一种证伪——证明（“有益的假设”）——再证伪的认识循环使我们不断接近于真理，这就是所谓科学。

波普这里讲的是全称判断式知识的归纳缺陷。另一些经验知识是非全称判断的（通俗地说：它们是“现象”，而不是“规律”），这些知识也可以通过逻辑演绎（而不是归纳）来得到扩展与深化。而演绎过程同样也可以证伪，而且除了波普讲的那种“反归纳的”经验证伪外，对演绎过程的证伪还依赖于逻辑证伪：即使“常识”本身无误，但依据这些知识进行的推理若有逻辑悖谬，那么结论也是错的。

例如日常的经验观察告诉人们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人们据此得到地静日动的“常识”，西方的地心说、中国的浑天说与盖天说等都是建立在这个“常识”的基础上的。但哥白尼通过观察与推理，成功地证伪了这个“常识”。尽管他提出的“日心说”也是可以证伪的并且后来的确被证伪了，但哥白尼的“科学革命”仍然是不朽的。哥白尼证伪了地静日动这一“常识”，牛顿、伽



利略则从关于引力与落体的经验常识中建构了古典物理学的理论体系。这都是“在常识基础上的（当然不局限于常识的）思想”。当然，在常识基础上思想未必就伟大，但它至少是实在的。

而无视常识的思想，则从安徒生那则“皇帝的新衣”童话中人们对并不存在之物的自欺欺人式赞美，直到我们熟知的“水变油”、“胡神医”、“亩产 x 万斤”之类的伪知识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些“知识”之伪并不在于它们否定了常识，而在于它们根本无视常识。如今有人说，“亩产 x 万斤”之所以获信于圣聪，是因为某科学家说过常规农作物光合作用能量转换率极低，如果提高之，则产量必惊人增长。由此证明理论误人。其实上述能量转换率低云云并不是伪知识，而是至今仍能成立的“科学”，它本身并不误人。关键在于“如果提高之”——那“转换率”能吹口仙气就“提高”么？无论老农的日常经验还是科学家们已上升为理论的行内“常识”都知其不可，但人们就是随声附和，一如安徒生笔下那些人齐声赞颂“新衣”之美丽。可见，在很多情况下，“无视常识的思想”并不是因为真的无知，而只是因为缺少了良知！那种东西的泛滥也不是因为科学水平低，而是由于体制性的弊病。但这种状况如果长期持续，倒的确会反过来使人们逐渐习惯于“无视常识”，因而不仅良心上而且智力上也发生退化。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就不仅仅是在拯救知识，而且也是在拯救良心了。

今天的思想界“无视常识的思想”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表面上把常识捧得很高，但却根本拒绝围绕常识的思考——无论证明还是证伪。例如有人习惯于这样指责别人：你的某某说法符合于常识，因此是多此一举；你的另一些说法则违背了常识，因而是显然荒谬。证明常识是不必要的，而证伪常识是大逆不道的，于是关于常识的任何思想都不必要了。——“常识”在这里只是一根大棒，而“常识基础上的思想”，不论是证明还是证伪，却都

给棒杀了：牛顿没有必要把“不言自明的常识”变成具有严格证明的自洽理论，哥白尼胆敢否定地静日动的常识更是罪该万死。

关于常识的任何思想既然都不必要，那“无视常识的思想”就自然会泛滥起来，于是就有了第二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就是公然以藐视常识为荣，甚至以完全没有证伪内容的违背常识之论作为自己学问高深的证明。前不久有这么一场讨论：某学者“发现”鸦片战争前英国人把汉语之“夷”字英译为某个贬义词，进而指责英国人造谣，把一个充满友好意愿的字眼强加了贬义并借以煽动英人仇华，又进而认为过去那种认为英国人重实利而中国人爱面子的说法不对，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正是因为他们极爱面子，受不了翻译者故意捏造的贬义而悍然动武！

这样一个非常“新颖”的论点不仅在逻辑上与道义上都让人难以理解：把一场公认为出于牟利目的的战争说成是为维护面子和荣誉而发动，这究竟是在谴责还是美化战争发动者？把利益、制度、文化上的严重冲突这一战争背景说成是仅仅出于某个居心不良的翻译者有意“误译”，这与作者想表达的“左翼”立场不是明显矛盾吗？

但这些且不论，关键在于把中文的“夷”字译成贬义词究竟是不是误译？汉语中的“夷”字本来并无贬义吗？作者自称的这一“发现”无论与自己想证明的观点是否有违，首先它就与公认的“夷”为贬称的常识相冲突。于是批评者提醒说：汉语中的“夷”字的确是有贬义的，你看连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都把它注明为贬义词哩！没料到，这一批评竟使得该作者大为不屑：我在美国名牌大学已是任教多少年的名教授，你竟然对我谈什么《新华字典》？这是在讨论学术吗？

呜呼！无视常识而至于斯，实在令人吃惊。大学名教授发现也许只具有常识水平的《新华字典》的解释有误，是完全可能

的，她若论证了这一点，不仅是对批评者的恰当回应，也是对学术本身的一个贡献。但她根本不屑论证，就认为常识对她这个美国名牌大学名教授全然没有价值，可以不予理睬地踏在脚下，这就太荒唐了！哥白尼否定了由太阳东升西落推出地静日动的“常识”，他是伟大的。而一个白痴大叫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他当然一点也不伟大。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严肃地证伪了一个前人认为的“常识”，而后者根本是无视常识。“在常识的基础上思想”与无视常识的胡思乱想，区别就这么大！作为名牌大学（还是美国的！）的名教授，对（好像是中国人的？）常识应该持什么态度，特别是在该教授又念念不忘表现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的情况下？

总之，高深的学术、精邃的思想，并不必然是与“常识”相绝缘的思想。相反，如果我们把“常识”理解为一般人公认的经验信息与初级形式逻辑的总和，那么，重视公认经验知识、遵守基本推理逻辑，加上（至少对人文知识分子而言）起码的人道良知与求智的真诚——这是成为大思想家与大学问家的必要条件，尽管可能并不是充分条件。

黄钟的这本书就是他“在常识基础上思想”的最新成果，其中不仅包含了许多历史与现实中的经验知识，更体现了他对这些经验进行的逻辑严谨的思考。这些知识并不深奥，但长期以来往往被遮蔽，这种逻辑并不复杂，但在指鹿为马的人那里并不被尊重。也许对这本书中的知识叙述与思想逻辑，有些人不能接受，那么，就请批驳他吧——从事实上与逻辑上！

2002年1月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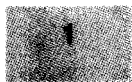
我们的青春和学术的意义

——“197 几”文丛总序

余世存

一批新学人的文丛，在热心的朋友们的参与下，即将问世。在筹办的过程中，我听到了不少的故事，首先，这些新人们，都是 70 年代出生的，他们跟正当红的美女作家们同龄。找寻这些如今以新人类活跃在社会上的一代人的思想者，可不如寻找美女作家那样容易。听说，吴冠军先生是 1976 年出生的，我知道的林国荣先生更是 1978 年出生的。他们的知识功底自不待说，而且他们也自觉地思考生命和社会之重。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我因此愿意接受卢周来先生和出版社的邀请，读其样稿，并为之说几句话。

说到对新学人的期待或关注，我大概不算太晚。1996 年前后，经朋友提醒，我开始注意到 90 年代高校学生的情况。我自己是 60 年代出生，80 年代在高校受教育的这一代人。我们闷头闷脑地被赶到社会上后，无论是知识准备还是心理准备相当不够。我仅仅知道我们对艺术、真理、知识等等曾登堂窥奥，我们见识过某种新异的人生境界，我们的使命乃是让我们的同胞了解并拥有生的灿烂。至于才学识等等倒在其次，反正那时的我心里特别地虚，在大学入宝山空归的感觉庶几类似，当然到现在也仍觉得自己无特异，无大能。我们空有理想、青春、热血，缺乏足够的学识和经验，这种理想情操使我们对人生有自己的标准，不仅知



道同龄人的背叛，也明了他人的距离。例如对上一代人，四五一代，上山下乡的一代，我们是悲悯的，觉得他们的青春虚掷得可以；而对后生小子大抵是轻视的，觉得他们接近物欲，他们大部分都俗得可以。因此，尽管我们知道自己的悲剧，我们仍觉得自己足够坚实足够自豪，我在《哀朱海军》一文里，就这么说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凉心眼要么看兄长一代们帮忙帮闲，要么看新人类们莺莺燕燕。

为什么要用“代”来立论？因为代际存在是我们社会的主导形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大学里明明都学会了现代社会那种科学的分析说明，届，级，等等。我们在届级一类的划分里相辅相成，共生共荣。但为什么到了社会上（自然也包括大学体制）却摇身变成了代的存在。代际的更替总是以革命性否定性为本质来完成的。假如我们想到第三代第四代一类的字眼，想到新生代，新人类，新新人类一类的字眼，上一代人必须退出历史舞台，才有后代人的活动空间；新人们必须用各种方法例如身体写作一类，才有可能颠覆上一代人的活动方式，……我们也许能承认我们社会这种最为实在现象的悲剧或滑稽性质。

这是我们社会的特性之一。那就是，直到今天，我们的知识流布极为艰难、狭窄。同样的知识内容很难均匀地分布到知识人那里，更难指望下一代人有同样的接受和运用效果。而知识之外的际遇，参与了知识人的身份构成。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几乎没有什么积累或连续性，其抱残守缺为人诟病又无可奈何。每一代人都参与了革命性的破坏，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极端表面的形式。如果说传统中国的知识至多是跟着王朝解体而出现革命的现象，（因为道统的延续，其革命多表现为道统内部的学派创新），那么，近来以来的中国知识则在代与代之间发生了造反式革命。即以上个世纪为例，30年代北平的沙龙如何看得上五四的激昂，40年代救亡的声音又如何容得下知识演进的从容，50年代

则更要在一穷二白上描画蓝图，60年代要彻底否定以前，70年代自以为拨乱反正，80年代引进西方知识以进行思想启蒙，90年代以学术热轻嘲启蒙的空疏。假如我们诚实地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得承认这种革命现象，不是知识本身生发的革命，而是每一代人借助于知识之外的力量，进行造反，进行代际的疏离和相互敌视；不是知识的延续更新，而是知识霸权的更替，言必称希腊者，言必称马列者，言必称传统者，言必称后现代者，言必称全球化者。合法性正当性被抛离一边，共和共生的多样丰富被弃置，当一代知识人的主流地位或体制权威确立后，就只剩下对其他人的敌视封锁屏蔽，剩下命令利用粗暴教训，剩下体制权力带来的腐败僵化保守。而知识的传承更新竟需要一代人的退场才有可能，一代人如果不是因为自然原因（高龄、死亡），就不会出现新一代知识人的机会和得意。而我们看到，除旧布新，用时髦的话说，不过是双方或各方争夺知识的霸权，是争夺权力的位置。

这恰恰说明，我们近代以来的知识体制里的身份职位都是缺乏现代性说明的伪身份职位，我们的知识霸权是缺乏文明道统支撑的伪权力。我们的知识在世界知识和现代理性的参照下，尚未能完成传统知识结构向现代知识体制的更新，如前说，知识体制必须容纳各方的知识创造，自由独立是其标准也是目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知识体制仍需要其所归属的知识人来说明，从而，这个我曾称为前现代社会的伪身份伪权力大大诱惑了知识人，以为自己一旦占据体制的身份就能攻破体制的堡垒，就能发布深刻伟大的学术思想；新一代知识人要想占据体制就得推翻和革命掉旧的知识人。貌似维新，却在所谓“学术思想”的名义下迫害限制了其他人的学术思想，客观上不过是占据了体制的好位置，并不能使体制革新。这种悖论使我们的知识界充满了代与代之间的革命，维新进步一说无从谈起。四五一代人在90年代最具

有创造性表演的时间就面临着这种紧张难堪，他们以为体制内的位置和知识里的创造是可以兼得的，尽管有人质疑过他们是否是独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仍以为能够代言知识、良知和正义。就这样，这个知识的体制是需要改造甚至废掉的，可是我们缺少另外的身份感来抗击它（民间办学和民间学人还未能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知识界没有自觉合力对抗这一伪身份体制的诱惑，没有权力自觉及正当实践，从而有效地消解知识体制的僵化腐败，使我们的知识体制有着开放的自由、机会活力和权威尊严。

这种体制如何改造或废掉？我不知道确切的答案。我和一些朋友划分过百年来几代中国学人，与其说我强调的是革命，不如说我呼吁的是和解。我想说的是，所有那些自以为空前绝后具有超越特性的知识人，都将归队于他所属的一代人的精神使命。四五一代人，我这一代人，等等，也许历史在悲喜剧里赋予了他们不同的精神要素，但这些历史精神本身是并行而不相害的。假如一代人逆所谓天命或历史潮流，以知识、真理或良知正义一类的名义行事，命运会安排另一代人来为他们送行。那里同样有知识，有真理，有良知正义，更有青春。

如今，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上场了，尽管知识之外还缺乏大的历史事件使他们现身，或者，他们将永远消失在所谓的市场社会里，消失在世俗的微小叙事里。那是否是我们社会的幸事？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知识体制，我们知识的传承、荣耀和权利分配等问题永远锁定了。但是，就连知识体制外，大量流亡江湖的我这一代、四五一代都在以各种方式消解嘲弄着体制的岸然道貌，而且，据我所知，北京的一些年轻朋友也在近两年对知识体制进行了有力的抗争。这说明，知识体制的存废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年轻的朋友们从对西方经典的解读入手，一步步抵达知识、生活的真理殿堂。正是有西方经典等世界知识作为理由，他

们对当代汉语知识的简陋了然于心。（是否也对现行中国知识体制的局限或专横了然于心？）我那时关注他们，听说他们将要有所贡献于学术，坐冷板凳，自觉与浮躁的现实社会保持距离，为此不惜对现实保持沉默以与现实体制绝决。我的敬重之心难以言表。悲剧性的在于，他们的知识活动，他们超越于“城邦”现实之上的哲学家般的生活，也不会是一块净土，他们仍得立足于他们与之保持距离的城邦现实本身。这种现实体制限制了他们的革命性本质。他们也将走一代代人的老路，理想颓唐，沮丧无力，人生造化，原来如此。

是的，即使与他们的大学青春期比，时代也发生了质的变化。90年代初“淘金”的希望何止于纯粹经济领域，不仅项飏先生有那样好的际遇和勇气；而且，民办学校也风起云涌，小学中学大学，知识的传承对官学的惟一性和绝对性构成了竞争；大量的青年学人流入社会，他们自有与体制距离的眼光和创造抱负。……但是，今天，所有这些良性的因素已经消失，浙江村在市民的眼里消失，民众对生活不再充满暴富的希望，只有苟活的不安恐惧和仇恨；民办学校是官学的复制物，工具性更为明显，他们无力也无意识创建自己的学术机制；而青年学人们也只有跻身于学院科研院所才有出头的可能；四五一代人的知识关怀日益减弱，尽管新左或自由主义的思路言路使知识界一度显出分裂之势，但他们人生中年虚无的心态已在体制里都乐得颐养天年；我这一代人也适应并消失在中国社会体制里，知识共同体的重建失去了力量。学术腐败因此能在越来越封闭和支离破碎的学术界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少数流落民间的独立或自由撰稿人要么孤军奋战，要么寄身于戏子娱乐的行业。我们的时代充满了热闹，但我们的希望落空，我们收获的是跳蚤，当初种下的可都是龙种。

幸又不幸的是，青春仍在，青春也是自足的。当现实社会无任何声援、呼应时，革命会与青春同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城

邦”的新生活新经济新文化等等的出现，当代汉语思想界呈现疲乏之相，无力参与影响中国人的社会公共生活时，在四五一代和我这一代渐渐消歇之时，终有一些朋友打破沉默，面向社会发言，这既是青春的内在要求，也是革命的逻辑要求。这些年轻的朋友们，余杰、安替、吴冠军、卢周来、程亚文、谢有顺、黄钟、李猛、高超群、张健、于杰，等等正成为我们这个众声喧哗时代的语言之声，而年轻得让人生顾惜之心的林国荣、王怡们，正以知识思想的坚硬质地应对着我们社会的荒唐闹剧。这些并不全然能与读者见面的文字终于以文丛（虽然初步只有几位作者）的形式出版，或者能给有心人不小的启示。

我之看重这些文字，是因为这些文字多来自不曾受体制污染的目光，黄钟先生的文字真正属于“抽屜文字”，他的言路因诉诸常识的思路而为纸质媒体拒绝；谢有顺先生的文字有着域外的批评分析气质，他直面现象同情而有耐心；程亚文先生则在思考一个民族如何自处并与其他民族国家共处时有着难得的自由独立的心态；至于卢周来先生，其对社会公正的担当近年来已成为知识界重要的话题之一。我相信 70 年代学人对中国社会的介入有助于汉语知识为中国人早日寻找到那个“说法儿”。中国人生多罪与苦，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安慰用嗷嗷待哺一说绝非虚词。有那么多的江湖庸医大行其道，有那么多的所谓繁荣的思想随笔的出现，我想，关于我们时代社会的真知灼见的必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想想看，我们在知识里活得像模像样，那么，年轻的朋友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的社会的？我们的社会接近了人的常识吗？我们的外交哲学平易健康吗？我们的经济生活公正吗？我们的文艺创作提升过我们的生活吗？这些大而具体的问题也是新人类们，本文丛的几位作者黄钟、程亚文、卢周来等先生思考的问题。

既然人生多苦罪，那么，庸医或各类中华将开太平的功法所

提供的，不过是“伪善”“傻美”（毛喻原先生语，他是四五一代人）一类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林国荣先生语，他是70年代生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批判精神的在场。所谓批判精神的在场，一定是体制内的权力自觉和权力实践。体制外，不过是历史或自然的辩证法则，即青春、思想的存在本身的要求。既然我们的知识体制已经失去合法性，已经弃置正当性，那么，批判精神只能由青春、思想来继承。知识体制或知识共同体，和中国“说法儿”，这双重的任务落到新一代学人身上，正说明我们民族的某种悲剧，即不仅我们知识体制内缺乏自我更新的机能，而且民族成员的各阶层、集团缺乏权力自觉和权力实践，社会的批判精神就仍只能落实到青春血肉之躯那里，落实到对知识还新鲜、自觉、尊重的知识人那里，落实到笃信知识乃是祛除人生苦难的思想写作者那里。

游手好闲地思想



黄钟 1970年生，湖南省麻阳县人。政治学者，资深编辑。近年来在各种媒体上发表文章数十篇。1997至1998年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往后推》、《超越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障碍》、《非公有制经济呼唤修宪》、《警惕滋生官僚资本》等采访报道；1998年以来，以公民权利保障为主线，发表了长篇政论《告别民族主义》、《消除隔离》、《为了忘却的平等》、《乍暖还寒已是春——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为统一市场呐喊》等。这些文字均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黄钟的这本书是他“在常识基础上思想”的最新成果，……这些知识并不深奥，但长期以来往往被遮蔽，这种逻辑并不复杂，但在指鹿为马的人那里并不被尊重。

——秦 晖